

# 當我們懷念旅行時,在懷念什麼?

每一次去長途旅行,到了最後的一兩天,會突然思家情切,很想快點回去。不知道是因為疲倦還是想念香港的食物,總之,人在異鄉,心里已經想着回家之後要吃點什麼。

可是,回家一段日子之後,我又會懷念那一趟長途旅行,渴望什麼時候可以再去一次。

旅行的人,是不是都會這樣?

去年游意大利,最後的一頓飯是在羅馬吃的。大伙兒想去吃意大利菜,我卻堅持要吃中國菜。吃了許多天的意大利菜,雖然美味得很,但是,我實在有點膩了,只想吃一頓清淡的中國菜。

結果,在一家台灣人開的餐館里,

我吃了一頓不中不西的菜。那是我自己選擇的,無可抱怨。

回來後,卻後悔當時沒有去吃意大利菜。路途遙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去羅馬。在昏天暗地的忙碌中,愈發懷念旅途中的日子。

在旅途中渴望踏上歸途。歸來了,又渴望再一次踏上旅途。什麼時候,可以拋下一切,休假一年,書也不寫了。只是,這一刻,還有太多放不下的東西,又怕自己在旅途中思家。

人總是在日子消逝之後才深深地緬懷,旅程如是,愛情如是,甚至是友情,好像也是從前的比較美好。一去不回的,最讓人心馳神往。下一次旅行,想必又是在消逝之後更懷念。



## “掙”來的愛情

在蘇聯流亡女作家安·阮德(Ayn Rand)的三部影響巨大的小說中,她多次提到女性(抑或男性)渴望愛情,卻不懂得真摯、牢固的愛情是該去“掙”的;不“掙”而獲得的愛情首先是非分的,其次絕不可能持久。她用“earn”這個英文單詞,即掙,使我生出許多感觸。生活中許多實例說明,一切失敗的婚姻都是因為人們忽略了這個“掙”字;一旦進入婚姻,愛情便似乎有了保險,往後的一切災禍都該由婚姻這個保險公司來負責或承擔損失。也就是說,男女雙方不再去繼續“掙”得愛情,而把對方已付出的或正付出的愛當成“該着”。

我在國內和國外都碰到過不少男性和女性,天生麗質,聰穎可愛,但在愛情和婚姻中並不順利。因為他們天生資本充足,從來不必去“掙”得愛慕。對於這類男女,似乎整個世界原本就“該着”他們情分,因而他們開銷任何人給予的愛都手腳極大,不知珍視。他們不懂得,一個人在情感生活中只消耗而

幾個決定性因素:一、理智地選擇一位具有大量美德的戀愛對象;二、婚前無肉體接觸的純情戀愛;三、達爾文的成功與疾病。艾瑪是個相貌平平的女子,因而達爾文在選擇她做愛人的時候是務實的,是違逆雌性愛美天性的。婚後,達爾文的名望持續上升,但他總是珍視艾瑪所給予他的樸素關愛。他認為艾瑪是一個能使他勤奮工作又能使他不至於勤奮到忘記人間樂趣的女子。在他們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婚姻中,達爾文不斷地“掙”得艾瑪的愛情和關懷,艾瑪也同樣“掙”得達爾文的愛慕和尊敬。艾瑪說:“(似乎自嘲地)沒有任何東西能像疾病那樣把一對男女牢牢系在一起。”她在達爾文患慢性疾病的20多年中,給予他精神和肉體的雙重關愛,使達爾文在輝煌的成功中對艾瑪情有獨鍾。在達爾文的自傳里,他寫道:“她(艾瑪)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一份幸運……我常常在想,如此的一個比我優秀得多的女子,怎么就能成為我的妻子。”

不儲蓄是危險的。有價值、有質量的愛情永遠要去主動地“掙”得。“掙”的過程,是成長、成熟、純化的過程,是辛勤和真誠地付出的過程。

這使我想起兩年前讀過的《道德動物》,它是關於達爾文的一本進化論心理學著作,其中的主要研究課題便是男性與女性的關係。這本書以達爾文的愛情和婚姻作依據,總結出達爾文和他妻子艾瑪的婚姻成功的

由此看來,他們從來都沒有停止努力去“掙”得對方的愛情,他們都不把對方的愛看成“該着”。

達爾文的顯赫聲望使艾瑪的一位姑媽不禁為艾瑪捏一把汗。艾瑪一向在穿着上缺乏興趣,所以總是過分樸素甚至落伍。這位姑媽在一封信中規勸姪女:“別忽略那些小小修飾,它們使你看上去總是賞心悅目。你忽略是因為你認為自己的丈夫不在意女性的這些外在細節。其實任何男人都在意這些細節。”

我無法得知艾瑪是否把她姑媽的話聽進去了,是否在以後的日子里盡力地“賞心悅目”。但從這位姑媽的見解來看,她是相信“掙”這個字眼的;別以內在的“掙”就夠了,外在的,也需要去“掙”。達爾文的妻子艾瑪

在《道德動物》中,有一段是講著名作家狄更斯的。狄更斯在剛結婚時把他的妻子稱爲他自己“更好的那一半”。20多年後,他的名望招來無數年輕美貌女子的愛慕,他眼中的妻子便是一個“無形無狀”的“東西”了。那曾經“更好的一半”在多年後成了“無感覺、怨恨的、怠倦的——近乎無人味的”女子。兩個人類文明的巨星——達爾文與狄更斯,有着極端不同的愛情和婚姻經歷。當然,這和他們全然不同的個性有很大關係。但可以看出,婚後名望直線上升的狄更斯輕易地就從愛的主體變成了客體,只知開銷,不知去“掙”,於是他和妻子凱瑟琳的關係就形成了惡性循環——誰都不去“掙”,但誰都大手大腳揮霍。可以想見,狄更斯該對這場失敗的婚姻負主要責任。正如許多成功的男性(抑或成功或絕頂美麗的女性),狄更斯認爲愛可以信手拈來,用不着去“掙”得。他不能有殷實、純正的愛情,是因為他被愛寵壞了,被不勞而獲的戀慕弄得殘廢了,失去了“掙”得愛的能力。

世界上沒有心安的人。我想,不光中國人心不安,全世界的人都是心不安的。發達國家的人民很富裕,但他們也有煩惱,也會感到焦躁。大家只不過煩惱和焦躁的內容不一樣。

人的慾望不斷膨脹,不斷變化。有了慾望,人就難得心安。慾望小,人的心里可能會更踏實一點;慾望太大,內心就要焦躁得多。有人發出“中國人心安何處”的疑問,那是因爲,今天的國人,內心深處的慾望確實是空前膨脹的,每一個人都在慾望中生活。想要心安,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慾望縮小再縮小,減少再減少。

但這其實是做不到的。你沒有這樣的慾望,就有那樣的慾望。每個人的慾望都是不一樣的。一個知識分子,他的慾望可能是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一個農民,他的慾望可能是讓自己的土地有更多的收成;一個工人,他的慾望可能就是自己的工資能夠再高一點。我們都在慾望中生活,甚至一個100歲的人,他的身體如果足夠健康的話,他可能還想要活到110歲、120歲。

我想,“心安何處”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問題,也是整個人類的問題。沒有慾望可能就不會有人類今天的文明,但有了慾望,我們就不可能心安。這是一種矛盾,一種悖論。

人們往往會從道德的角度來批判一個人對金錢的慾望,但好像又會從生命的角度去理解一個活了100歲的人想要活到120歲。其實,凡是超出可能範圍的慾望,我們都需要進行克制。

一個人對金錢、房子、汽車有慾望,想要過得更好,我們很難簡單地說這好不好。我甚至覺得它是合乎常理的。但如果它超出了可能的範圍,違背了社會規範的要求,那一切都是荒謬可笑的。

不過,可能與不可能之間的度如何去把握,涉及每一個人的理性、道德感、智慧及感悟等。如果把握不好,內心就會失去平衡。

每個人其實都是按照自己的邏輯,在可能的範圍內產生慾望、理想,進行生活的。不要高估了我們的煩躁和不安,因爲世界上所有的人面對整個人類、面對未來時,都在焦躁着、不安着。不是這樣的焦躁,就是那樣的焦躁;不是這樣的不安,就是那樣的不安。

## 注定無法心安



住院前,醫生說爲了放化療我必須把頭髮剪短。剪頭髮那天,我特意叫了一個做視頻的哥們兒來幫我拍紀錄片。機器架好,美髮店里的氣氛“轟轟烈烈”,鏡頭里的我笑中帶淚。我都計劃好了,電視劇里演患者接受放化療肯定會掉光頭髮,所以我要做一個關於“頭髮”的紀錄片,講的是我入院前把長髮剪短,放化療後頭髮漸漸掉光,之後又生長恢復的過程。拍攝可能要歷時三年或者更久,主題是“新生”。我那哥們兒很仗義,拍着瘦弱的胸脯說:“只要你召喚,我立馬扛着機器出現。”

這個想法太酷了,我頓時覺得放化療都“高大上”了起來。可是,打完化療針等着頭髮掉光光的我被醫生告知:“你打的是鉑類藥,不掉頭髮。”這樣啊,真叫人不開心啊,這樣一來我的放化療就一點兒都不酷了。

不從壞的事情里找好玩的事兒的話,那么這件事情,就真的只有壞了。

入院不久,隔壁病房住進來一位大叔,60歲左右,江西人,是一個“生猛的土豪”。我在放療室門口碰見他,大叔穿着長款黑色大衣,頭髮染成油亮的黑,精神十足地對我說:“小妹不要怕,要唱歌,要笑,晚上一起K歌去!”大叔平日愛聊天,老神神秘秘地要人猜他的年紀,爲的是得意揚揚地引出一句:“我都快六十了!找了個25歲的老婆,剛給我生了個兒子。”他自己來住院,沒有陪護,我媽問:“那你吃飯誰照顧?”大叔手一揮:“有錢!叫飯店送!”一個月後再見到他,他已被放化療徹底打趴下了。人還是那個人,拍着胸口說“老子有錢”的生猛氣場卻被奪走了。我逗他說:“K歌去?”他擺擺手,給我看錢包里的照片——一個年輕姑娘抱着個嬰兒。他說:“就是想兒子了,兒子剛滿三個月。”按照時間來推算的話,他查出病來時,剛剛老來得子。然後這個男人跟家人瀟灑地揮揮手說“老子出國玩兩個

月”,只身趕赴北京治病。

隔壁住着一位75歲的東北老太太,來陪護的是大兒子,一米八幾的東北大漢。老太太瘦極了,體重不到60斤,縮在被子里只有小小的一團。睡不着是她多年的老毛病,患癌症後失眠加劇,常整晚整晚地醒着,醫生就給她開了安眠藥。老太太不肯吃,也不肯說原因,就這樣生扛了三天。實在扛不住了,她憂心忡忡地決定吃藥,半晌忽然一把拉着兒子的手囑咐說:“你晚上要來看看我,你要喊我的名字。”那天夜里好幾次,她在黑暗中睡下,又焦慮地起身,一遍又一遍地叮囑兒子:“晚上要來看看我,你要喊我的名字。”兒子說:“媽,你放心睡吧,我隔一會兒就來喊你一回,你放心睡吧。”原來睡不着,是怕醒不來。只有深懷恐懼的人才看得到,夜晚是死神的白日,它拿着鐮刀寸步不離,就在我們床邊等着,等着把措手不及的人們帶入無盡的黑夜。

2012年3月初春,北京下雪了。同病房唱豫劇的大姐告訴我這叫“三月桃花雪”。她說記得上一次雪下在桃花上的3月,20歲的她登台唱戲。那時她還不是主角,台口催着“快快快”她一急,里頭穿着薄秋衣,外頭挂着大戲服就上台了,冷得聲音都在抖,當年那出戲叫《大祭椿》。我們正聊着,聽到走廊里一陣沉悶的哭聲,跑出去一看是另一個病房的病人家屬。那女孩是我的老鄉,比我年紀小,陪着老公從湖南來住院。聽說主治醫生勸他們放棄治療回老家,哭聲太悲慟了,其他家屬

就勸她別在這兒哭,一聲聲都是各家的眼淚,感同身受的人受不住,她就獨自下樓了。我跟着下樓,遠遠地看着她,小小的一個人,穿着紅色棉襖坐在雪地里。她嗚咽一聲,那團紅顫抖一下,像是一顆鮮活的心臟摔進了冰天雪地里。我便是從那一刻開始知曉,什么叫無能爲力。

這兩年見了太多人太多事,每一個都稱得上是平凡生活表面下的驚天動地。關於“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告別”,我困擾了很久。出院後我開始面對可怕的復查。健康的人很難想象肩膀痛、咳嗽、頭疼,這些小小的病症都會被聯想到癌細胞復發轉移,繼而使人陷入巨大的恐懼之中。我買了一些佛學的書,試圖參透無常。朋友的離開和自身的恐懼交織成不能確定的明天的世界。2013年,每一次復查前的夜晚,我都像被綁在椅子上,一雙手捂住我的嘴,頭上懸着明晃晃的、不知何時落下的刀。

爲了找到答案,我開始行走,天南地北地聽別人的故事。那些故事里有人離開,有人相愛,可即便再悲苦也有動人的篇章。我一路走,一路哭哭笑笑,就這樣發現有些問題根本沒有答案。復查好似過山車,命運把我高高地拋起,不知能否安然落地。可最後救了我的,其實也是復查。沒有任何一種美好比知道自己平安活着更美好,爲此我要走過大段黑暗。

如果你根本無從應對突如其來的告別,那么就學着跟自己的恐懼相處。

我們之所以要思考上天給的這個問題,也許並不是要尋找答案,而是讓這問題帶領你跟命運達成共識。

接到這篇約稿時,主編告訴我,主題是“生離死別”,主編說:“你應該有話要說。”有什麼話說呢?我想了很久。你知道嗎?北京的各大腫瘤醫院任何時候都人滿爲患。走到大廳一看那么多人,哪個都不是小病,一個背影就是一個家庭的辛酸。我很少看到誰當衆哭,在你前面排隊的,等着拿報告的,人人都默默地走着流程,等着判決。生和死不是尋常的事情嗎?醫院里每一天每一個人最日常的事就是生離死別。我最近一次去復查,前面排隊做核磁檢查的兩位大姐嘻嘻哈哈地聊天:“你啥病?我肺癌。”“喲,我也是。你說今天怎么那么慢呢?我晚上還要回家做飯呢。”吃飯和生病,生和死,都是常事,我們能做的就是排着隊,身在其中,不卑不亢,不急不緩。來,我受着;不來,我感恩。

寫這篇稿的我剛去翻了下病友“三爺”的微博,忽然發現文字、照片被全部刪除了,微信也被注銷了號碼。“三爺”是乾淨利落的“三爺”,我懂了,也沒哭,哭哭啼啼對不住他的瀟灑。

從困頓和絕望中走過,在失聲痛哭後擦去眼淚的我,此刻的心安靜又溫柔,因爲這便是我能想到的死亡的樣子。它像湖水一樣安寧、冷清,深不見底。如果它是我們最深的恐懼,那么最終,我們一定能最溫柔地相處。唯有承認它、正視它,不妄想戰勝它,才可與它比肩共存。

被刪得干乾淨淨的“三爺”的微博只留下一句簽名“該怎么去告別”。原來這課題我們一直在一同研究,所以,就用這句作全篇的標題吧。感謝與你同行,願你獲得平靜美好。

我看到一句話,獻給你:

“那些你同樣無法承受、無法面對的懦弱和卑微,亦響亮。”

## 該怎么去告別

